

扎根



ZHA GEN

第一辑

徐志伟 乔焕江 主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黑龙江省普通高等学校新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资助(1253 - NCET - 014)

扎 根

Taking Root

主编 徐志伟 乔焕江

编委：(按姓氏拼音排序)

何吉贤 (中国社会科学院)

刘复生 (海南大学)

霍 炬 (陕西师范大学)

乔焕江 (哈尔滨师范大学)

蒋 晖 (北京大学)

徐志伟 (哈尔滨师范大学)

李 龙 (吉林大学)

张慧瑜 (中国艺术研究院)

李云雷 (中国艺术研究院)

赵 文 (陕西师范大学)

刘大先 (中国社会科学院)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扎根 / 徐志伟, 乔焕江主编. — 郑州 :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4. 8

ISBN 978 - 7 - 215 - 08790 - 3

I. ①扎… II. ①徐… ②乔… III. ①文化研究 - 中国 - 当代 - 文集②中国文学 - 当代文学 - 文学研究 - 文集 IV. ①G12 - 53②I206.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05559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65788075)

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美佳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19.75

字数 290 千字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 36.00 元

前 言

在本世纪初，“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一度成为中国大陆人文研究领域的显学。作为一种自觉回应当下问题的学术努力，其初衷本是以话语分析的方法揭示当代文化生产背后的意识形态机制，从而在更深广的意义上为反思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提供新的可能性。但纵观十几年来中国“文化研究”的实绩和走向，我们遗憾地发现，这种自觉回应当下问题的学术努力，已经逐渐沦为一种以不变（方法）应万变（对象）的学术操演，甚至停滞于对西方流行理论和学术运作模式的机械模仿。在我看来，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与研究者“问题意识”的虚幻性有着直接的关系——长久以来，很多研究者并没有真正建立起与现实的有效关系，一种不断向现实敞开的的话语能力也没有形成。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就亟需倡导一种“扎根”意识。

所谓“扎根”意识，并非简单的乡土情怀，更不是回到民族主义的老路，而是一种植根于中国问题与现实问题并努力找到这些问题与全球化问题的关联的自觉与冲动。我认为，唯有植根于真实的中国问题与现实问题，才能重建中国“文化研究”的意义。这也正是以“扎根”一词来命名本书的用意。

本书所辑的文章，均属于具有“扎根”意识的力作。其对中国经验的阐扬、对底层命运的关注、对在地经验的呈现，已经初步体现了中国“文化研究”的某种可能性。

“再解读”中所辑的五篇文章，第一篇植根于现代中国乡村问题，把近代以来的中国乡村纳入到资本主义全球化情境中进行考察，论述了中国近代乡村危机的根源以及合作化运动、“大革命”与乡村自治思想产生的背景，阐释了国民党政权在乡村逐渐走向失败的必然性，进而论证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的价值与意义。另外四篇，植根于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分别对社会主义喜剧、孙犁的“土改小说”、食指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1980年前后的工业题材小说作出了全新的阐释。《中国社会主义喜剧中的辩证运动——重思“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话语》一文，将社会主义喜剧的主体置于黑格尔美学及其阐释脉络里，考察了新人与喜剧主体之间的内在联系，挖掘了“新喜剧”的“形式”与“哲学”问题、人的塑造问题、社会主义共同体建构问题等的关联性。《大地村歌——孙犁“土改小说”中的“新人”叙事》一文，结合孙犁的“土改”经历，对其长久以来被研究者所忽视的“土改小说”进行了考察，并指出其与丁玲、周立波的差异，丰富了我们对于“土改文学”谱系的认知。《知青文学的诞生与城乡关系的骤然显现——〈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再解读》一文，结合“知青文学”得以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揭示了《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诗与中国特殊的城乡关系及文化政治之间相互生产的关系。《总体性、动员结构与改革想象——从1980年前后〈上海文学〉的几篇工业题材小说谈起》一文，通过对1980年前后《上海文学》的几篇工业题材小说的解读，呈现了1980年代的改革想象与前三十年的思想资源的关联，指出市场化改革不应被简化为自由主义的复辟，它同样是社会主义克服自身危机的一种方式。

“当下文艺观察”中所辑的七篇文章，前五篇植根于当下的底层问题，反思了1980年代的文学生产方式，阐释了“底层文学”的价值、局限性及可能性。《文学研究：告别1980年代——以“底层文学”叙事为例》一文，对1980年代形成的“认识型”思维模式的局限性进行了批评，并分析了“底层文学”观念对于“认识型”思维模式的反思性价值。《中国底层文学批评的理论可能——以李云雷“底层文学的整体批评”为例》一文，将李云雷的“底层文学的整体批评”置于全球底层理论话语兴起的大潮中，分析了其方式的独特性及理论上的可能性。《“重走青春”：“新底层”的未来想象》一文，将“坠落的中产”纳入到底层的视域，通过对影视剧中“新底层”形象的分析，指出了“新底层”的世界想象与消费社会逻辑的同构性。《中国乡村的“新现实”及其艺术化——读陈应松近作三篇》一文，细读了陈应松的三篇近作，分析了陈应松对乡村新现实与新经验的新发现，指出了陈应松之于“底层文学”的独特价值。《远离历史的“底层”——贾樟柯影片之空间构造方式分析》一文，通过对贾樟柯影片中空间构造方式的分析，指出了贾樟柯呈现“底层”的局限性：历史并没有有效地进入其所构造的底层空间。另外二篇，则立足于反思当下的文艺生产机制，观点也均具启发性。《无名袭来“莫

言风”：“莫贝尔”在中国》一文，认为莫言创作的内核是对1980年代文学和思想潮流的一种延续，是对西方关于中国想象的某种印证。而围绕莫言获奖展开的争论，恰恰是有关当代中国历史和现实最尖锐问题的体现。《家庭伦理剧中的“革命理想主义——〈激情燃烧的岁月〉和〈继父〉的生产策略分析》一文，指出了军旅题材电视剧自身的类型化以及与其他类型剧的交叉组合的现象，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不仅意味着军旅题材承担的国家意识形态对于大众文化元素的汲取和借重，反之，还意味着国家意识形态成为大众文化征用的对象，成为市场机制不断开拓的生产资料来源。

“社会观察与调查”中所辑的三篇文章，植根于社会现实与生活现场，宏观的观察与微观的体察并重。《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三重角色》一文，通过对近年来房产调控、山西煤改、足坛反赌等案例的分析，指出了在目前中国经济生活中，国家/政府充当的三重角色及其面临的困境，其中隐含着作者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以及对中国的期待。《关于深圳市风钻工工作状况的调查报告》一文，揭示了深圳市部分风钻工的恶劣工作环境及其对身体健康所造成的损害，并提出了关于改善风钻工工作状况和救治尘肺病工人的建议。这个调查报告所提醒的一个事实是：侵害工人的合法权益，虽然和个别企业的违法行为直接相关，但也离不开宏观的背景、甚至政策条件。所以，我们在呼吁严惩违法企业的同时，也应该深入地反思改革过程中的一些政策导向。《回乡随记》一文，通过对故乡的观察，揭示了当下农民的生活状态和乡村存在的一系列严峻问题，读后让人沉重。将此文与前面的《近代以来中国的合作运动、“大革命”与乡村自治》对读，别有一番意味。

“译文”中所辑的五篇文章，虽不直接关涉中国的现实，却有益于中国“文化研究”品质的铸造。阿尔都塞的《关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AIE）的说明》一文，对于我们准确理解“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一概念的含义并在中国语境中恰当使用这一概念无疑会有所帮助。费边的《时间与他者的出现》一文，对于我们反思西方中心主义，重建中国的主体意识，提供了诸多启示。而查特吉的三篇文章《政治社会的系谱》《乌托邦的和真实的时间中的人民》《〈庶民研究〉简史（1998）》不但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路径，也提示我们：扎根于本土的历史与现实之于“文化研究”是何等重要！

总体而言，本书所辑的文章不仅提供了让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同时也包含着研究范式的革新。尽管这些来自不同学科文章组合到一起，看起来有些

散乱，但我还是从作者们扎根于中国问题与现实问题的学术姿态中感受到了一种连绵不绝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使我愿意相信，这些文章所涉及的部分论题会渐渐成为中国“文化研究”的显要命题。

目 录

再 解 读

- 近代以来中国的合作运动、“大革命”与乡村自治 吕新雨 / 3
- 中国社会主义喜剧中的辩证运动 朱 羽 / 23
- 重思“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话语
- 大地村歌 鲁太光 / 41
- 孙犁“土改小说”中的“新人”叙事
- 知青文学的诞生与城乡关系的骤然显现 吴志峰 / 79
-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再解读
- 总体性、动员结构与改革想象 李 阳 / 85
- 从1980年前后《上海文学》的几篇工业题材小说谈起

当下文艺观察

- 文学研究：告别1980年代 李 龙 / 99
- 以“底层文学”叙事为例
- 中国底层文学批评的理论可能 赵 文 / 110
- 以李云雷“底层文学的整体批评”为例
- “重走青春”：“新底层”的未来想象 李玥阳 / 126
- 中国乡村的“新现实”及其艺术化 李云雷 / 136
- 读陈应松近作三篇
- 远离历史的“底层” 练暑生 / 145
- 贾樟柯影片之空间构造方式分析
- 无名袭来“莫言风”：“莫贝尔”在中国 何吉贤 / 152

家庭伦理剧中的“革命理想主义”	张永峰/166
——《激情燃烧的岁月》和《继父》的生产策略分析	

社会观察与调查

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三重角色	张慧瑜/179
关于深圳市风钻工工作状况的调查报告	
	潘毅 卢晖临 沈原 郭于华/189
回乡随记	贾鲁华/197

译 文

政治社会的系谱	[印] 帕沙·查特吉文	王立秋译/209
乌托邦的和真实的时间中的人民		
	[印] 帕沙·查特吉文	王立秋译/231
《庶民研究》简史(1998)	[印] 帕沙·查特吉文	王立秋译/254
关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AIE)的说明		
	[法] 阿尔都塞文	吴子枫译/266
时间与他者的出现	[荷兰] 乔纳斯·费边文	刘大先译/280

近代以来中国的合作运动

“大革命”与乡村自治

●○○○

再 解 读

中国农村合作运动的发展，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反映了农民对改善自身生活条件的迫切愿望，也体现了国家和社会对农村发展的关注。本文旨在探讨“大革命”时期乡村自治与合作运动的兴起、发展及其历史意义。通过分析当时的社会背景、政策导向以及农民的实际参与，揭示这一运动对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的深远影响。

中国农村合作运动的发展，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反映了农民对改善自身生活条件的迫切愿望，也体现了国家和社会对农村发展的关注。本文旨在探讨“大革命”时期乡村自治与合作运动的兴起、发展及其历史意义。通过分析当时的社会背景、政策导向以及农民的实际参与，揭示这一运动对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的深远影响。

对近代以来中国的合作运动的一个阶段，为什么在1911年辛亥革命

近代以来中国的合作运动、 “大革命”与乡村自治

吕新雨

近代以来，中国的乡村一直是中国政治的火药库。与传统的乡村动乱不同在于，鸦片战争后新的通商口岸和条约口岸的开辟，导致广东北江上游和梅岭通道的苦力和船夫失业，这成为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温床。而华南的秘密组织则是现代政党得以诞生和成长的基础，这也决定了这些新的组织形式必须基于利用和转换传统组织基础上以获取成功。动乱的乡村为现代政党以农民运动来推动革命奠定了基础，国共两党从 20 世纪 20 年代就联手开展农民运动，并使得乡村运动成为大革命成功的重要前提和保证，这一点极其关键，需要重新认识。这也是梁漱溟进行乡村建设的现实背景。

中国早期合作运动来源于欧洲 19 世纪为了抵御资本主义对社会的瓦解和破坏而出现的合作思想和实践，它们在晚清和“五四”运动前后传入中国，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大钊就大力宣传过日本武者小路实笃倡导的“新村运动”，鼓励青年到农村去。合作思想和合作运动是基于弥补社会解体而产生的自我保护功能和社会整合实践，而整体性的社会危机正是合作思想兴起的土壤。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 20 世纪二三十年兴起的乡村合作运动与 90 年代之后重新兴起的乡村建设与合作运动，是可以并置于一个历史视野里来观察的。但是，重要的不同在于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合作运动是围绕着“革命”和“救国”的复杂脉络进行的。早期合作思想的引进、推广和宣传，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大革命时期中国第一波乡村运动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准备。

20 年代的大革命是中国乡村运动的第一个高潮。为什么在 1911 年辛亥革命

中还处于消极被动状态的中国农民^①，十年之后却在大革命时期大规模地成为革命的积极推动者和参与者？其实，并不仅仅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依靠的是乡村动员和革命，1924年前后波澜壮阔的国民革命已经是这个历史的预演。在这个意义上，乡村革命与中国现代政党之间的关系是需要重新理解的。今天的流行观点是1949年之后的共产党统治摧毁了传统乡绅自治的社会结构，这是违背基本历史事实的。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来自于20年代的国民革命，它的历史前提正是传统社会的崩解和失序，这就是为什么20年代最具有动员力的口号是：打倒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它表明了晚清以来乡治危机与革命之间的互动关系，正是农村经济的凋敝与国家赋税不断加重的压榨，迫使地主与农民的关系不断恶化，无法再维持乡绅自治的传统格局。

在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最蓬勃的是湖南。而湖南近代以来，自耕农急剧减少，尤其是铁路沿线地区。1926年底的统计，靠近长沙的湘乡地区基本已经没有自耕农，佃农的比例达45%，雇农占30%，同在铁路线上的离长沙较远的衡阳地区，自耕农的比例是7%，佃农的比例也为45%，雇农占15%，离粤汉线较远的平江、邵阳地区，自耕农的比例为17%和16%，而更远的常德地区，自耕农比例则高达31%，它说明了“新兴的军事政治官僚因为集中在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上，因此对土地的需求也主要集中在这附近的地区”。^②且地租额很高，往往田主占十分之七，佃农只有十分之三，失地农民生活极度贫苦。^③因此，湖南农民对北伐的支持非常热烈，由传统军阀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前敌总指挥唐生智曾说：“我们这次革命的成功，完全是工农群众的力量，并不是兵士的力量。我们在北伐的时候，在衡阳，在醴陵，在粤汉路，都得着工农群众的帮助，才得以很顺利的杀却敌人。”^④孙科则明确说道：“现在一般的民众，乃至党内的同志，却都有不少是怀疑农民运动的

^① 鲁迅写于1921~1922年的小说《阿Q正传》，敏锐而深刻地呈现出辛亥革命与农民之间的悖论关系。

^② 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11页。材料来源：（苏）A. B. 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郑厚安、刘功勋、刘佐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16~219页。

^③ 金冲及：《从迅猛兴起到跌入低谷——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前前后后》，载《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④ 金冲及：《从迅猛兴起到跌入低谷——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前前后后》，载《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人。他们掂拾一两件农民运动初期的病态的幼稚举动，便想（把）本党的农民运动根本抹煞。”“革命以（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任何个人的意思，乃是因为当时的民生实在受着重大的压迫。……爽快说句，中国的农民实在都有革命的要求，还有什么可疑惑之点呢？”^①

晚清以来的乡村，当传统的地方宗族组织无法提供强有力的公共保障体系的时候，这个空缺就必然由不同的势力来填补。而土地在近代社会过程中的不平衡聚集，也为大革命的爆发使现代政治进入乡村提供了历史的契机。中国现代史上的乡村运动第一个高潮始于20世纪20年代大革命期间，之后既是在其基础上的延续和推进，也是不同的政治理念和革命实践的大较量。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合作运动的发展是以乡村而不是以城市为角逐的场域，它与20年代的大革命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这一点也根本不同于西方的城市合作运动。

从中国早期合作运动的发展来看，合作主义其实是为当时的各种政治力量所利用，政治光谱极为广泛。它既成为早期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为反对阶级斗争、社会革命的改良主义所实践，更为无政府主义思潮所青睐。其共识是合作主义是建立救济穷人，特别是贫困小农的经济组织，因此它必然要与正在破产的乡村产生密切而复杂的关系。但是，第一拨由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所推动开展的早期中国合作主义运动，其实践多为在城市中建立的各种消费合作社，这些合作社的生存大都不超过两年。1924年，《平民》周刊的停刊标志着早期中国合作运动的失败。^②《平民》周刊由复旦大学学生创办，在中国早期合作运动和思想的先驱者薛仙舟的影响下，成为早期中国合作运动宣传的主要阵地。但是，其成员在实践中逐渐意识到由学

^① 孙科：《国民革命中之农民运动》（续），1927年3月15日《湖南民报》，转引自金冲及：《从迅猛兴起到跌入低谷——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前前后后》，载《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② 《平民》周刊由复旦学生的平民学社主办，该学社创办于1920年，其成员最多时达100多人。由于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担任过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因此很多著名的国民党人来此担任教职，使复旦成为国民党人革命活动的中心。《平民》周刊最初作为孙中山《民国日报》的免费副刊发行。后薛仙舟从德、美留学归国，来到复旦，在他的指导下，从第5期起，《平民》周刊成为致力于宣传合作主义的刊物。1924年，出版了212期后停刊。参见陈意新：《二十世纪早期西方合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历史研究》2001年6期。

生和知识分子所建立的合作社是无法长久的，合作运动需要与大众运动结合，与劳工和农民结合，到民间去，才能够有生命力，否则就只能是在衰草枯枝，生气全无。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其成员逐渐认为合作运动必须首先参加到国民革命中去，以推翻军阀统治为实现合作运动的前提。^①

1924年国民革命爆发，中国的合作运动因此走入与中国的政党政治相结合的新阶段。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改革农村组织，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方法之一就是成立合作社。”^②被称为中国合作运动之父的薛仙舟将西方的合作思想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结合在一起，他与早期很多国民党人关系密切，与孙中山、戴季陶等相识很早。孙中山系统阐发过三民主义合作经济思想，而戴季陶则研究过西方、日本和俄国的合作运动，并为国民党起草过第一份合作社法草案，以图以合作社为手段实现社会经济改造。由薛仙舟所培养的合作主义的思想通过他的学生们传递到中国的政党政治之中，其平民学社的很多成员后来都成为国民党合作事业的积极参与和推动者。陈果夫作为薛仙舟的学生，受薛仙舟感召极深，并因此成为国民党合作事业的领袖，他认为合作运动是处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中庸之道，他希望用作为民生主义的合作运动来抵御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

1924年7月，平民学社刚解散，国共两党以及原平民学社成员就在上海筹建中国合作运动协会，毛泽东与国民党人陈果夫和叶楚傖、平民学社的许绍棣和张廷灏组成五人筹备委员会，参加会议的有戴季陶、汪精卫、胡汉民、邵力子，以及平民学社的其他领袖和社会上宣传合作社的著名人士马君武等几十人，^③阵容非常可观。但是，这种大联合的局势很快就因国共合作破裂而结束。

共产党方面从事合作运动的早期理论家则是于树德。1918年，于树德曾和周恩来一起留学日本学习经济，受到日本社会主义者河上肇的影响，对日本的合作理论有深入研究。1921年回国在天津任教，主讲合作理论，这期间

① 陈意新：《二十世纪早期西方合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历史研究》2001年6期，第89~102页。毛传清：《论五四前后合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第56~62页。

② （韩）柳镛泰：《农民协会和合作社：走向民粹主义》，载《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29页。

③ 陈意新：《二十世纪早期西方合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历史研究》2001年6期，第100页。

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过三篇论述合作社与农业救灾问题的长文^①。于树德与李达钊结识很早，1922年曾与李达钊一起去俄罗斯参加远东民族会议第一次代表大会，后由李达钊等人介绍入党，并担任天津共产主义小组组长。

1920~1921年华北大旱灾，政府救济迟缓，以美国的传教士为主建立的赈灾组织华洋义赈会开始在中国制定农村合作政策，致力于提高农村的水利工程建设和经济制度的改进。义赈会考虑了中国传统的合会和欧洲的合作社形式，决定把德国的雷发巽（Freidrich Raiffeisan）在灾荒时代创立的农民信用合作社介绍到中国，即让农民自己筹款组成合作社基金，以低利率贷给社员用于发展生产，增强抗灾能力，并免除高利贷盘剥。但是义赈会真正开始合作社实验是在找到和聘用于树德之后，于树德很快在河北开始建立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实践。^②

于树德曾在1923年参加共产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讨论国共合作和统一战线问题，会后，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1924年，于树德参加了国民党一大的召开，并与李达钊、谭平山一起被选入中央执委，毛泽东、瞿秋白、林伯渠、张国焘等人被选为候补执委。为了不牵连义赈会，于树德1926年辞职，由其助手继续主持义赈会的合作事务。他在华洋义赈会讲习总会授课时留下大量讲义，成为义赈会的指导性文件，后编辑成《合作社之理论与经营》（1929年）和《合作讲义》（1934年）出版。1926年北伐战争后，于树德来到广州担任黄埔军校第四期教官，随后担任广州农民运动江西所讲师，主讲《农民合作概论》，又受毛泽东之邀，到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武汉）讲授农村合作等。其间，参与毛泽东主编的《农民问题丛刊》等的编写工作，负责第九种《农村合作概论》的写作，刊登于国民党农民部机关刊物《中国农民》（1926年3期）。^③

由此可见，共产党的农民运动与华洋义赈会的合作社实践之间存在着交集，并直接影响了其后在苏区、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合作社方针，它也因此成为研究毛泽东早期对农民运动思考的资源。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

^① 于树德：《农荒预防与产业协济会》《产业协济社之经营》《我国古代至农荒预防策略》，《东方杂志》第17卷第20、第21期（1920）、第18卷第3、第4、第5期。

^② 陈意新：《华洋义赈会的农民合作运动和中国现代农业金融的困窘》，载《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44~645页。

^③ 王东宾：《于树德先生——革命者与合作专家》，未刊稿，多谢作者提供。

运动——〈农民问题丛刊序〉》中明确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这些道理，一直到现在，即便在革命党里面，还有许多人不明白。”^①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梳理农会的十四件大事时，特别把“合作社运动”列入其中：“合作社，特别是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确是农民所需要的。他们买进货物要受商人的剥削，卖出农产要受商人的勒抑，钱米借贷要受重利盘剥者的剥削，他们很迫切地要解决这三个问题”^②。

1927年8月，武汉分共，武汉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清党决议把于树德和毛泽东都列入了“一律开除党籍并褫夺现职”的名单之中。^③此后，于树德逐渐退出政治领域，30年代进入燕京大学任教，教授合作理论，并继续从事合作社实践工作。1931年再次到华洋义赈总会帮助办赈以及合作事务，并担任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农利股主任。20年代合作运动的两股主要力量，一是国共合作期间由政党推动建立的合作组织，另一就是1923年成立的华洋义赈会。至1934年，国民党全国经济委员会开始将全国的所有合作社统一接管，华洋义赈会的活动遂告结束。^④

20年代中国现代政党政治的活跃和大革命的氛围，直接促进了中国第一波乡村运动的高潮，革命需要乡村的支持，^⑤革命也需要解决乡村的问题，特别是土地问题。1922年共产国际已经开始告诫亚洲的革命者要转向本国的土地问题：“东方各落后国家的革命运动，如果不依靠广大农民群众，就不可能

①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40~41页。

③ 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28页。

④ 陈意新：《华洋义赈会的农民合作运动和中国现代农业金融的困窘》，载《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49页。

⑤ 北伐将领张发奎在攻破武昌后说：“这一场战争，我们是以寡胜多、以弱胜强，以落后的装备战胜了优良的装备。我们胜利的主要原因是民气，湖南的农民运动缩短了我们战争的时间，株萍铁路与粤汉铁路的工人运动及铁路工作队与我们配合作战，缩短了我们战场上的空间。在浏阳作战时，我们独立团被敌军强大部队包围，形势非常险恶，因为农民协会领导的武装农民从敌人的后方铺天盖地而来，给敌人一个很大的威胁，才解了围。民众的伟大力量，在这次战争的作用是了不起的，在这样的军民一体、万众一心的情况下，会师中原，为时当在不远。”见《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8页。